

□财经前沿

# 公共支出结构、最优税收与经济增长

金成晓 张东敏

**[摘要]** 在一个两部门经济中,采用参数化和数值模拟的方法,探讨在不同目标设定下,公共支出结构对最优税收选择及其经济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最大化条件下,最优资本所得税与最优劳动所得税均等于公共支出占正规部门产出大小。在福利最大化条件下,最优所得税取决于公共支出用途:当公共支出全部用于基础建设时,最优劳动所得税等于最优资本所得税;当公共支出用于基础建设和转移性支出时,最优劳动所得税小于最优资本所得税,转移性支出占总支出比重越高,最优劳动所得税越低,最优资本所得税越高。在我国当前税制结构下,降低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改进,减小偷逃税规模。在其他税收收入可以满足政府预算约束条件下,资本所得税下降28.57个百分点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下降28.13个百分点可以实现福利最大化。

**[关键词]** 基础建设支出;转移性支出;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经济增长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197)

**[收稿日期]** 2015-02-11

**[DOI]** 10.15939/j.jujss.2016.05.002

**[作者简介]** 金成晓,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暨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张东敏,通信作者,吉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长春 130012)

## 一、引言

税收是保证一国财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如何选择税收结构最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改进,一直都是公共经济学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从社会契约角度看,公民和政府之间是契约的关系,公民之所以愿意纳税是因为政府提供了公共服务。因此,要建立最优税制必须考虑公共支出,凡不考虑公共支出的税制,不可能是最优的税制。以此思想为基础,学者们将公共支出纳入最优税收问题的研究框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Barro 构建了同时包含税收与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sup>[1]</sup>,得出最优收入税等于生产性公共支出占产出的比例。Barro 开创了从公共支出内生角度研究最优税收问题的视角,Lau、Turnovsky & Fisher、Park & Philippopoulos、Chen、Economides *et al.*、金戈等人沿着 Barro 的思路,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引入消费性公共支出,求解出了最优收入税应满足的条件。<sup>[2-7]</sup>其中,金戈认为最优资本税应为0,最优消费税和工资税的组合应一正一负,以保证消费和劳动的相对价格不变,次优总收入税取决于生产性公共支出产出弹性、时间贴现因子和消费产出比。<sup>[7]</sup>王麒麟进一步将消费性公共支出内生化,分析了最优税收与生产性公共支出和消费性公共支出对最优税率的影响。

响。<sup>[8]</sup> Futagami *et al.*、Greiner & Haunch 在 Barro 的基础上, 引入了生产性公共资本, 推导出了最优税负水平。<sup>[9-10]</sup> 其中 Futagami *et al.* 推导出的最优税负水平小于 Barro 认为的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sup>[9]</sup> Barro & Sala-i-Martin、Fisher & Turnovsky、Turnovsky、Gomez 将生产性公共支出的拥挤性引入生产函数, 探讨最优税收问题。<sup>[11-15]</sup> 其中, Fisher & Turnovsky、Turnovsky、Gomez 得出最优收入税与拥挤性程度成反比的结论。<sup>[12-15]</sup> Judd 提出, 公共支出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 因此将生产—消费混合型支出同时纳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 分析其对最优税收的影响。<sup>[16]</sup> 金戈和史晋川借鉴 Judd 的思想, 将公共支出分为纯生产性的、纯消费性的、生产消费混合型的、纯粹的政府消费, 通过比较分散均衡路径和社会最优路径的欧拉方程, 得出社会最优收入税率应为 0 的结论; 但如果只能以收入税为公共支出筹资, 则次优收入税率等于每一种支出弹性之和。<sup>[17]</sup>

综合以往研究, 我们可以看出, 生产性公共支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产出的促进作用上, 消费性公共支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上。从直觉上看, 生产性公共支出多一些, 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消费性公共支出多一些, 更有利于福利改进。如果追求经济增长率最大化, 则应该增加生产性公共支出比例; 如果追求福利最大化, 则应该增加消费性公共支出比例。即在不同目标下, 政府最优公共支出结构是不同的。根据金戈的研究<sup>[7]</sup>, 最优公共支出结构直接决定最优收入税, 因此, 我们有理由猜测在不同目标下, 公共支出结构对最优税收的选择具有不同的影响。以往文献多是侧重政府支出总量或某一类政府支出对最优税收选择的影响, 本文拟在借鉴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研究不同目标设定下公共支出结构对最优税收选择的影响。

## 二、模型框架

### (一) 模型基本框架

在我国, 个人所得税只覆盖人口的较小部分, 而且主要局限在城镇地区, 基本上没有涉及农村地区; 同时, 我国关于个人收入的统计信息很少且不可靠。因此, 建立在对全部要素均可征税基础上的最优税收模型在我国并不适用。借鉴 Penalosa & Turnovsky 的研究<sup>[18]</sup>, 假定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 一个是可征税的正规部门, 另一个是不可征税的非正规部门, 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生产函数均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且规模报酬不变。正规部门是资本密集型的, 非正规部门是劳动密集型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消费水平还比较低, 因此消费者会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劳动, 即使有剩余时间, 消费者也会投入到其他兼职工作中, 因此, 假设劳动无弹性供给, 模型具体说明如下:

#### 1. 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

假设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代表性企业的生产函数如下:

$$Y_1 = A_1 K_1^\alpha (KL_1)^{1-\alpha} \quad (1)$$

$$Y_2 = A_2 K_2^\beta (KL_2)^{1-\beta} \quad (2)$$

其中,  $Y_1$  和  $Y_2$  分别表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代表性企业的产出;  $A_1$  和  $A_2$  表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技术水平;  $K_1$  和  $K_2$  表示投入到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代表性企业的资本数量;  $L_1$  和  $L_2$  表示投入到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代表性企业的劳动数量;  $\alpha$  和  $\beta$  表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代表性企业的资本产出弹性;  $K$  表示代表性企业投入的总资本存量, 即  $K = K_1 + K_2$ , 总的资本存量越大, 越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 2. 消费者

假设代表性消费者具有无限寿命, 每个消费者供给单位劳动, 其中  $L_1$  分配到正规部门,  $L_2$  分

配到非正规部门。同时假设代表性消费者初期拥有的资本存量是  $K_0$ ，在  $t$  期，代表性消费者拥有的资本存量是  $K_t$ ，其中分配到正规部门的资本存量是  $K_1$ ，分配到非正规部门的资本存量是  $K_2$ 。代表性消费者的目标是选择每一期的消费水平、分配到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实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假定如下：

$$\max \int_0^{\infty} \frac{1}{\gamma} C_t^\gamma e^{-\rho t} dt \quad -\infty < \gamma < 1 \quad (3)$$

其中， $C_t$  代表  $t$  期消费， $1/(1-\gamma)$  表示消费跨期替代弹性， $\rho$  代表时间贴现因子，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如下：

$$\dot{K} = r_1(1-\tau_K)K_1 + \omega_1(1-\tau_L)L_1 + r_2K_2 + \omega_2L_2 + T - C \quad (4)$$

$$L_1 + L_2 = 1 \quad (5)$$

$$K_1 + K_2 = K \quad (6)$$

$$\lim_{t \rightarrow \infty} \lambda_t K_t e^{-\rho t} = 0 \quad (7)$$

其中， $r_1$  代表正规部门资本的边际回报， $r_2$  代表非正规部门资本的边际回报； $\omega_1$  代表正规部门劳动的边际回报， $\omega_2$  代表非正规部门劳动的边际回报； $\tau_K$  代表资本所得税率， $\tau_L$  代表劳动所得税率； $T$  代表转移支付。

### 3. 政府部门

假设政府部门只能对正规部门征收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税率分别为  $\tau_K$  和  $\tau_L$ ，假定  $\tau_K$  和  $\tau_L$  均是内生的。假设政府支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正规部门需要的基础建设支出，记为  $\phi Y_1$ ，其中， $\phi$  称为基础建设支出率；另外一种是面向所有消费者的转移支付，其值为  $\theta Y_1$ ，其中， $\theta$  为转移支付率。政府预算约束如下：

$$\tau_L \omega_1 L_1 + \tau_K r_1 K_1 = (\theta + \phi) Y_1 \quad (8)$$

### 4. 社会资源约束

$$\dot{K} = (1 - \phi) Y_1 + Y_2 - C \quad (9)$$

## (二) 竞争性均衡方程

### 1. 竞争性均衡定义

本文的竞争性均衡是指存在一个财政政策序列  $\{\tau_K, \tau_L, \phi, \theta\}$ 、要素序列  $\{K_1, K_2, L_1, L_2, Y_1, Y_2\}$  以及价格序列  $\{r_1, r_2, \omega_1, \omega_2\}$ ，使得：

1) 总产出增长率等于资本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2) 在预算约束给定的前提下，代表性消费者通过选择消费水平、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工作的时间及资本分配极大化自身福利水平；3) 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通过选择投入劳动和资本的数量实现利润最大化；4) 政府预算平衡；5) 劳动力市场均衡，消费者劳动供给与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劳动需求总和相等；6) 资本市场均衡，家庭的资本供给总量等于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资本需求量之和。

### 2. 竞争性均衡方程组成

为了便于分析，令  $k_1 = K_1/K$ ， $k_2 = K_2/K$ ，设均衡状态经济增长率为  $\Omega$ ，福利水平为  $W$ ，设  $c = \frac{C}{K}$ 。根据竞争性均衡定义，可以得出竞争性均衡方程如下<sup>①</sup>：

$$k_1 + k_2 = 1 \quad (10)$$

① 如需了解详细计算过程，可向作者索要。

$$L_1 + L_2 = 1 \quad (11)$$

$$(1 - \tau_K) \left[ A_1 \alpha \left( \frac{L_1}{k_1} \right)^{1-\alpha} \right] = A_2 \beta \left( \frac{L_2}{k_2} \right)^{1-\beta} \quad (12)$$

$$(1 - \tau_L) A_1 (1 - \alpha) \left( \frac{L_1}{k_1} \right)^{-\alpha} = A_2 (1 - \beta) \left( \frac{L_2}{k_2} \right)^{-\beta} \quad (13)$$

$$\Omega = \frac{A_2 \beta (L_2/k_2)^{1-\beta} - \rho}{1 - \gamma} \quad (14)$$

$$c = (1 - \phi) k_1 A_1 \left( \frac{L_1}{k_1} \right)^{1-\alpha} + k_2 A_2 \left( \frac{L_2}{k_2} \right)^{1-\beta} - \Omega \quad (15)$$

$$W = \int_0^\infty \frac{1}{\gamma} C^\gamma e^{-\rho t} dt = \frac{1}{\gamma} \frac{c^\gamma}{\rho - \gamma \Omega} K_0^\gamma \quad (16)$$

$$(1 - \alpha) \tau_L + \alpha \tau_K = \theta + \phi \quad (17)$$

$$\frac{d\Omega}{d\tau_L} = \frac{A_1 (1 - \alpha) (\tau_K - \tau_L)}{(1 - \gamma) ((1 - \tau_L) (L_2/k_2) - (1 - \tau_K) (L_1/k_1))} \left( \frac{L_1}{k_1} \right)^{1-\alpha} \left( \frac{L_2}{k_2} \right) = 0 \quad (18)$$

$$\frac{dW/d\tau_L}{\gamma W} \Big|_{\tau_K=\tau_L=\tau^*} = - \frac{A_2 (\tau^* - \phi)}{\alpha (1 - \tau^*)^2} \frac{(L_1/k_1) (L_2/k_2)^{1-\beta}}{c ((L_2/k_2) - (L_1/k_1))} = 0 \quad (19)$$

由式(10) — (18) 构成了经济增长率最大化条件下的竞争性均衡方程组, 由(10) — (17)、(19) 构成了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竞争性均衡方程组。如果给出参数具体值, 通过均衡方程组, 我们可以将变量  $(\tau_K, \tau_L, L_1, L_2, k_1, k_2, c, \Omega, W)$  的均衡值求出。

### 三、我国最优税收结构的选择及其经济效应

#### (一) 参数化

为了了解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及福利最大化条件下我国最优税收结构及主要经济变量的取值, 我们采用参数化的方法设计一个能够模拟中国经济的“基准模型”, 在参数取值方面, 尽可能使用中国实际数据和经典文献中对中国经济相关参数的测算值。

关于资本产出弹性, 我国现实经济中资本产出弹性大小存在较大争议, 不同学者估算的结果差别很大, 但通常都在 0.3—0.7 之间。由于正规部门资本相对密集, 因此, 我们假定正规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是 0.7, 即  $\alpha = 0.7$ 。在本文中, 非正规部门是指政府不容易征税的部门, 其资本产出弹性数据不容易获得。由于服务业除了资金投入以外, 更多的是智力资本及信息技术等隐性要素投入, 因此服务业更容易逃税。本文参考服务业资本的产出弹性来估计非正规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根据杨勇的研究<sup>[19]</sup>, 非正规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是 0.4, 即  $\beta = 0.4$ 。关于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 根据顾六宝和肖红叶的研究<sup>[20]</sup>, 中国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在 0.1918—8.9688 之间。本文根据通常设定, 假设中国经济中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是 2, 从而  $\gamma = -1$ 。关于贴现率, 根据严成樾和龚六堂的研究<sup>[21]</sup>, 取贴现率为 0.019, 即  $\rho = 0.019$ 。公共基础建设支出主要指政府生产性支出, 根据王麒麟的研究<sup>[8]</sup>, 政府生产性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科研支出、教育支出、农业支出、林业支出、水利和气象支出、工业和交通支出等。在本文中, 转移性支出主要指政府以再分配形式转移给居民个人的支出, 根据统计年鉴数据, 将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视为转移性支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4》, 我国公共基础建设支出占产出比例是 9.09%, 转移支付支出占产出比例是 3.34%, 即  $\phi = 9.09\%$ ,  $\theta = 3.34\%$ 。为

简化运算, 假设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技术水平参数  $A_1 = A_2 = 1$ , 初始资本存量  $K_0 = 1$ 。关于基准参数的取值, 列于表 1 中。

表 1 基准参数取值

| 参数 | $\alpha$ | $\beta$ | $\phi$ | $\theta$ | $\rho$ | $\gamma$ | $A_1$ | $A_2$ | $K_0$ |
|----|----------|---------|--------|----------|--------|----------|-------|-------|-------|
| 取值 | 0.7      | 0.4     | 9.09%  | 3.34%    | 0.019  | -1       | 1     | 1     | 1     |

## (二) 不同目标下最优税收结构的选择

表 2 列出了经济增长率最大化条件下, 不同政府支出结构对最优税收结构及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由表 2 可以看出, 政府支出结构对最优税收结构的选择没有影响, 即在样本经济条件下, 若追求经济增长率最大化, 应设置劳动所得税率等于资本所得税率等于 12.43%。此时我们看到, 在均衡增长路径上, 分配到正规部门的劳动和资本均少于非正规部门, 说明从长期来讲, 仅对正规部门征税会使得资源向非正规部门转移; 反过来, 偷逃税部门产出越大, 越不利于正规部门征税, 进而会影响政府职能的发挥。之所以得到的均衡经济增长率较高, 是因为我们没有将政府支出纳入生产函数。如果将政府支出的外部性纳入生产函数, 非正规部门的存在必定会降低均衡经济增长率。同时, 由表 2 我们还可以看出, 公共支出结构对长期消费和福利水平有影响, 政府转移支付支出越多, 单位资本消费水平越高, 福利水平越大。

表 2 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下主要经济变量的取值

| 支出结构                             | $\tau_L$ | $\tau_K$ | $L_1$  | $L_2$  | $k_1$  | $k_2$  | $c$    | $\Omega$ | $W$     |
|----------------------------------|----------|----------|--------|--------|--------|--------|--------|----------|---------|
| $\phi = 0.1243, \theta = 0$      | 0.1243   | 0.1243   | 0.0742 | 0.9258 | 0.2191 | 0.7809 | 0.7915 | 0.2120   | -5.4692 |
| $\phi = 0.0909, \theta = 0.0334$ | 0.1243   | 0.1243   | 0.0742 | 0.9258 | 0.2191 | 0.7809 | 0.7968 | 0.2120   | -5.4329 |
| $\phi = 0, \theta = 0.1243$      | 0.1243   | 0.1243   | 0.0742 | 0.9258 | 0.2191 | 0.7809 | 0.8112 | 0.2120   | -5.3365 |

表 3 福利最大化条件下主要经济变量的取值

| 支出结构                             | $\tau_L$ | $\tau_K$ | $L_1$  | $L_2$  | $k_1$  | $k_2$  | $c$    | $\Omega$ | $W$     |
|----------------------------------|----------|----------|--------|--------|--------|--------|--------|----------|---------|
| $\phi = 0.1243, \theta = 0$      | 0.1243   | 0.1243   | 0.0742 | 0.9258 | 0.2191 | 0.7809 | 0.7915 | 0.2120   | -5.4692 |
| $\phi = 0.0909, \theta = 0.0334$ | 0.1140   | 0.1287   | 0.0759 | 0.9241 | 0.2205 | 0.7795 | 0.7969 | 0.2119   | -5.4328 |
| $\phi = 0, \theta = 0.1243$      | 0.0950   | 0.1369   | 0.0789 | 0.9211 | 0.2225 | 0.7775 | 0.8119 | 0.2118   | -5.3346 |

表 3 列出了在福利最大化条件下, 不同政府支出结构对最优税收结构及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由表 3 可以看出, 在不同的公共支出结构下, 最优劳动所得税率和最优资本所得税率是不同的。当增加转移支付支出时, 最优劳动所得税率小于最优资本所得税率, 转移支付增加得越多, 最优劳动所得税率下降得越多, 最优资本所得税率增加得越多。同上, 我们看到, 当存在偷逃税部门的情况下, 从长期看, 资本和劳动更多地转移到了不征税部门。具体分析如下: 当政府支出全部用于基础建设支出时, 最优劳动所得税率等于最优资本所得税率等于 12.43%。结合表 2 可知, 此时既实现了经济增长率最大化, 又实现了福利最大化。当政府将全部支出的 27% 用于转移支付时, 最优劳动所得税率下降了 8.29%, 最优资本所得税率增加了 3.54%。由于最优劳动所得税率下降得比较多, 促使正规部门劳动和资本均增加了 2.29% 和 0.64%, 相应的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和资本均下降了 0.18% 左右。由于较高的资本所得税降低了资本的回报率, 于是经济增长率下降; 同时, 消费者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消费, 于是消费增加了 0.68%, 福利水平增加了 0.67%。当政府支出全部用于转移支付时, 最优劳动所得税率下降到 10% 以下, 最优资本所得

税率增加到 13% 以上。同上, 正规部门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进一步增加, 非正规部门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进一步减少, 经济增长率继续下降, 福利水平改善明显, 相比全部支出用于基础建设支出的情况, 消费增加了 2.58%, 福利水平增加了 2.46%。

综上, 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 不同目标设定下, 最优税收结构的选择不尽相同, 经济增长率最大化条件下最优劳动所得税率普遍高于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最优劳动所得税率, 经济增长率最大化条件下最优资本所得税率普遍低于福利最大化条件下的最优资本所得税率。第二, 不同公共支出结构对不同目标下最优税收的选择不同。当全部支出用于基础建设时, 最优资本所得税率等于最优劳动所得税率, 此时, 既实现了经济增长率最大化, 又实现了福利最大化; 当存在政府转移支付时, 经济增长率最大化条件下最优资本所得税率等于最优劳动所得税率, 而福利最大化条件下最优资本所得税率小于最优劳动所得税率。

### (三) 选择最优税收的经济效应

为了体现选择最优税收结构的经济效应, 下面计算当现实经济中的税收结构调整到最优税收结构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关于现实经济中资本所得税率和劳动所得税率的估算参考郭庆旺和吕冰洋的方法。<sup>[22]</sup>以 2003—2013 年为样本经济, 经计算可以得出, 我国劳动所得税率为 11% 左右, 资本所得税率为 41% 左右, 即  $\tau_L = 0.11$ ,  $\tau_K = 0.41$ 。同时, 为了了解征税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引入一个新的变量“偷逃税规模”, 并将其定义为正规部门产出与非正规部门产出的比例, 记为  $S$ 。其他参数取值同上文, 以此作为基准经济, 考察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和福利最大化两种条件下选择最优税收结构时, 经济增长率、福利水平及偷逃税规模的变化。

表 4 选择经济增长最大化下最优税收的经济效应

| 不同情况            | $c$    | $\Omega$ | $W$     | $S$    |
|-----------------|--------|----------|---------|--------|
| 基准经济            | 0.7395 | 0.1325   | -8.9261 | 1.6052 |
| 劳动所得税取最优        | 0.7347 | 0.1302   | -9.1240 | 1.6497 |
| 资本所得税取最优        | 0.7939 | 0.2157   | -5.3673 | 0.5356 |
| 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均取最优 | 0.7968 | 0.2120   | -5.4329 | 0.5504 |

表 4 列出了当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取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下最优值时主要经济变量的数值。由表 4 可以看出, 当劳动所得税由 11% 增加为最优值 12.43% 时, 由于政府支出挤出了私人投资, 经济增长率反而略微下降, 消费水平也略微下降。由于福利水平主要取决于消费和经济增长率, 因此福利水平下降了 2.22%。由于部分劳动从正规部门转移到了非正规部门, 因此偷逃税规模增加。当资本所得税由 41% 下降到最优值 12.43% 时, 由于经济增长率主要取决于资本的税后回报, 因此经济增长率增加了 62.79%, 消费水平增加了 7.36%, 进而福利水平增加了 39.87%。由于正规部门是资本密集型的, 资本所得税下降后, 资本的税后边际回报增加, 促使资本从非正规部门转向正规部门, 因此导致偷逃税规模下降了 66.63%。当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均取最优值 12.43% 时, 经济增长率增加 60%, 消费增加了 7.75%, 福利水平增加了 39.13%, 偷逃税规模下降了 65.71%。由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 当  $\tau_L = 0.11$ ,  $\tau_K = 0.1243$  时, 经济增长率达到最大, 但是不满足政府预算约束的要求。而最优税率  $\tau_L = 0.1243$ ,  $\tau_K = 0.1243$  是在满足政府预算条件下求得的, 即在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目标下, 应提高劳动所得税率 1.43 个百分点, 降低资本所得税率 28.57 个百分点。当找到新的税源能够保持预算约束平衡时, 劳动所得税率可以保持 11% 不变, 而资本所得税率降低 28.57 个百分点, 此时得到的经济增长率更大。

表 5 选择福利最大化下最优税收的经济效应

| 不同情况            | $c$    | $\Omega$ | $W$     | $S$    |
|-----------------|--------|----------|---------|--------|
| 基准经济            | 0.7395 | 0.1325   | -8.9261 | 1.6052 |
| 劳动所得税取最优        | 0.7367 | 0.1312   | -9.0390 | 1.6306 |
| 资本所得税取最优        | 0.7953 | 0.2141   | -5.3948 | 0.5446 |
| 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均取最优 | 0.7969 | 0.2120   | -5.4327 | 0.5532 |

表 5 列出了当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取福利最大化下最优值时主要经济变量的数值。由表 5 可以看出,当劳动所得税由 11% 增加为最优值 11.40% 时,由于政府支出挤出部分私人投资,经济增长率和消费水平分别下降了 0.98% 和 0.38%,福利水平下降了 1.26%。由于劳动所得税增加导致部分劳动从正规部门转移到了非正规部门,因此偷逃税规模增加了 1.58%。当资本所得税由 41% 下降到最优值 12.87% 时,经济增长率增加了 61.58%,消费水平增加了 7.55%,福利水平增加了 39.56%。由于资本更多地转移到了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产出减少,于是偷逃税规模下降了 66.07%。当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均取最优值时,经济增长率增加 60%,消费增加了 7.76%,福利水平增加了 39.14%,偷逃税规模下降了 65.54%。由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当  $\tau_L = 0.11, \tau_K = 0.1287$  时,福利达到最大,但是不满足政府预算约束的要求。而最优税率  $\tau_L = 0.1140, \tau_K = 0.1287$  是在满足政府预算条件下求得的,即在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应提高劳动所得税率 0.40 个百分点,降低资本所得税率 28.13 个百分点。当找到新的税源能够保持预算约束平衡时,劳动所得税率可以保持 11% 不变,而资本所得税率降低 28.13 个百分点,此时可实现福利更大。

####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下,探讨了最优税收与公共支出结构的关系及最优税收的经济效应问题。研究认为:1) 在经济增长率最大化条件下,最优资本所得税与最优劳动所得税均等于政府总支出占正规部门产出比。2) 在福利最大化条件下,最优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的选择取决于公共支出结构。当政府支出全部用于基础建设支出时,最优劳动所得税与最优资本所得税均等于基础建设支出占正规部门产出比;当政府支出用于基础建设支出和转移支付支出时,最优劳动所得税小于最优资本所得税,转移支付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越高,最优劳动所得税越低,最优资本所得税越高。3) 在当前税制结构下,降低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改进,同时有利于减小偷逃税规模。4) 在其他税收收入可以满足政府预算约束时,资本所得税下降 28.57 个百分点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率最大化,资本所得税下降 28.13 个百分点可以实现福利最大化。

本研究为我国制定反映政府职能定位的最优税收结构提供了理论指导。结合本文的结论,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完善我国现行税收结构。第一,提高劳动所得税率的起征点,同时增加劳动所得税的累进程度,一方面可以减轻低收入个体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所得税的平均税率。第二,提高中小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的起征点,减轻中小企业缴税负担,给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第三,开征遗产税,全面征收房产税,适时开征污染税等新税种,拓宽税收收入来源,减少政府收入对资本所得税的依赖。第四,增加保障性住房、公费医疗等社会福利性支出,降低个人支出在总支出结构中的比重,最大程度减少征收劳动所得税对福利

水平的影响。第五,完善税务登记、征收、审计与监督一体化系统,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同时建立有奖举报制度和偷逃税行为的惩罚制度,加大偷逃税成本,提高举报收益,为政府职能的发挥提供充足的财力支持,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

[参考文献]

- [1] Barro R 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5): 103 - 125.
- [2] Lau S-H P. Welfare-maximizing vs. growth-maximizing shares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Economics Letters*, 1995, 47 (3): 351 - 359.
- [3] Turnovsky S J, Fisher W H. 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995, 19 (4): 747 - 786.
- [4] Park H, Philippopoulos A. Dynamics of taxes, public services, and endogenous growth. *Macroeconomic Dynamics*, 2002, 6 (2): 187 - 201.
- [5] Chen B L. Economic growth with an optimal public spending composition.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06, 58 (1): 123 - 136.
- [6] Economides G, Park H, Philippopoulos A. How should the government allocate its tax revenues between productivity-enhancing and utility-enhancing public goods? *Macroeconomic Dynamics*, 2011, 15 (3): 336 - 364.
- [7] 金戈:《经济增长中的最优税收与公共支出结构》,《经济研究》,2010 年 11 期。
- [8] 王麒麟:《生产性公共支出、最优税收与经济增长》,《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 年 5 期。
- [9] Futagami K, Morita Y, Shibata A. Dynamic analysis of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with public capital.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95 (4): 607 - 625.
- [10] Greiner A, Hanusch H. Growth and welfare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with public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1998, 5 (3): 249 - 261.
- [11] Barro R J, Sala-i-Martin X. Public finance in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2, 59 (4): 645 - 661.
- [12] Fisher W H, Turnovsky S J. Public investment, congestion, and private capital accumulation. *Economic Journal*, 1998, 108 (447): 399 - 413.
- [13] Turnovsky S J. Public and private capital in an endogenously growing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 Dynamics*, 1997, 1 (3): 615 - 639.
- [14] Turnovsky S J. Old and new growth theories: An unifying structure? In Salvadori N (ed.) *Old and New Growth Theories: An Assessment*.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3.
- [15] Gómez M A. Optimal fiscal policy in a growing economy with public capital. *Macroeconomic Dynamics*, 2004, 8 (4): 419 - 435.
- [16] Judd K L. Optimal taxation and spending in general competitive growth model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9, 71 (1): 1 - 26.
- [17] 金戈、史晋川:《多种类型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0 年 7 期。
- [18] Peñalosa C G, Turnovsky S J. Second-best optimal taxation of capital and labor in a developing econom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 (5): 1045 - 1074.
- [19] 杨勇:《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再测算》,《世界经济》,2008 年 10 期。
- [20] 顾六宝、肖红叶:《中国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两种统计估算方法》,《统计研究》,2004 年 9 期。
- [21] 严成樑、龚六堂:《我国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分析》,《经济科学》,2010 年 2 期。
- [22] 郭庆旺、吕冰洋:《中国税收负担的综合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10 年 12 期。

[责任编辑:赵东奎]